

川大史学

(第二辑)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卷

主编 原祖杰
副主编 吕和应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二十一世纪工程」和「九八五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和二〇〇〇年九月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大史学

(第二辑)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卷

主编 原祖杰
副主编 吕和应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康 燕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卷. 第二辑 / 原祖杰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14-9862-0

I. ①川… II. ①原… III. ①史学—文集②史学史—文集③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018 号

书名 川大史学(第二辑)·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卷

主 编 原祖杰

副 主 编 吕和应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862-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 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 硕 刘复生 何一民 陈廷湘
杨天宏 原祖杰 彭裕商 舒大刚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长：霍 巍

副组长：舒大刚（常务）

成员：

李德英 李映福 李志勇 鲍成志 姜 莉

前　　言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大致说来，涉足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可粗略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概括和总结国内外既往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成果，即专门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另一类则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遵循一定的理论指导进行具体的实证性研究，然后又将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体会凝练成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大抵不出这两类，川大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也概莫能外。前者包括蒙文通先生编撰的《中国史学史》，李思纯先生译介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谭英华先生对博克尔和马考莱史学思想的介绍和评判以及对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校注，这些工作沟通了古今中西史学，使川大史学最初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后者以徐中舒先生的工作为代表。徐先生的著述以实证研究见长，专注于论证古史、考辨文字，然而我们仍可从中窥得徐先生史学思想之大端：其一是对王国维“古史二重证”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趋完善；其二是受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影响，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受傅斯年委托主持整理明清大内档案和 50、60 年代领导川大历史系整理巴县档案，这些举措都很好地诠释了傅氏史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

手动脚找东西”的思想方法，也为川大史学确立了重视文献、档案等原始材料的传统。

十年前，为迎接四川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历史文化学院曾编辑了《川大史学》第一辑，这一辑出版之后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单列为一卷。川大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可谓源远流长，除了上述老一辈史学家奠定的坚实基础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史学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以罗志田、何平、孙锦泉和徐波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川大学者，在这个领域取得不少新的突破。为此，在四川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编者希望通过编选近十年来川大学者的相关论文，以弥补编辑《川大史学》第一辑时留下的缺憾。

本卷将收录的论文大致划分为“学科反思和学术史”、“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三个板块。首先，国内专治史学理论的学者大多偏重于历史认识论研究，但事实上，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特定专业的学科反思往往也包含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且其宗旨与历史认识论大为不同；加之每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史回顾和展望也与通常意义上的史学史大异其趣，因而将“学科反思和学术史”单列为一编实属必要。其次，鉴于人类学与历史学、艺术史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交叉，我们也将其纳入到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大范畴中，并同样将其单列为一编。

由于编选时间紧张，再加上新一辑《川大史学》编委会商议决定，原则上只收录发表于2006年至2016年的论文，而且每位学者在各卷收录的论文总数不得超过两篇，为此，大量涉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优秀论文未能收录，其中包括罗志田的《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刘复生的《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特点》，霍巍的《二重证据

前 言

与西藏古史重构》，石硕的《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何一民的《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何平的《革命的模式、背景和结局》，孙锦泉的《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徐波的《从“整体史”到“全球史”——西方史学史的一条线索》，等等。这些文章的缺席，自然不能展示过去十年川大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全貌，加之我们编选水平所限，难免会有很多不足，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16年4月27日

目 录

第一编 学科反思和学术史

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罗志田(3)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杨天宏(21)
是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 ——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	
.....	原祖杰(35)
贾科诺夫的新社会阶段论.....	王献华(70)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	查晓英(86)
由“误解”发现“童年”：“阿利埃斯典范”与儿童史研究的 兴起.....	辛 旭(122)
扬·阿斯曼关于古埃及文明与“轴心期”理论的研究	
.....	王 欢(147)

第二编 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新进展.....	何 平(165)
论布鲁尼的人文主义史学.....	孙锦泉(185)
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	徐 波(203)
艾尔克·鲁尼亞与历史哲学的未来.....	吕和应(231)
14、15 世纪英国修道院编年史的写作特点及演变趋向	
.....	邹 薇(252)

第三编 跨学科研究

- 本土文化—历史理论:洛域的经验 陈 波(273)
文艺复兴时期的“paragone”与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建构
..... 刘 君(293)
- 从神到人的回归
——《维斯帕香诺回忆录:十五世纪名人传》与作者的新历史观 邓 丽(314)

第一编 学科反思和学术史

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罗志田^{*}

近年所谓史学碎片化的感叹，多受外国影响，^①却也有本土的渊源。贺昌群在 1934 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国粹学报》和《中国学报》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着它的价值”，不过只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表现出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这些“论文中新旧方法与观点的不同，显出绝大的矛盾”。他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②

贺先生的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寻求一种系统而贯通的解释，本是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多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贯通那些似乎不通的内容。因为没能做到学术步调的整齐，而反观到满眼零篇断目，这并非一两人的看法，也不是

* 罗志田，1952 年生，四川成都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① 不过，欧洲史家对“碎片”的感觉是很不一致的，对于多斯来说，碎片化是一个负面的现象（参见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对于安克施密特来说，这即使不是一个正面的追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参见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年，第 222~223 页）。

② 贺昌群：《一个对比》（1934 年），《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 卷，第 546 页。

一两天的事了。不过，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

首先，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① 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梁启超后来甚至提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故史家的工作，是“专务求‘不共相’”。^② 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至，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主体，他/它们的主体性，确不容忽视；而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独立的，这就奠定了往昔的独特性。^③

这一点更因史料存留的实质而强化。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就是像中国史学那样一直重视当下的记录功能，所能记下的也不过是一种人为选择的遗存；与未被选留的部分比较，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言，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是毋庸讳言的。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

我的基本看法，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

^① 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约1922年12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并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李大钊文集》（4），李大钊研究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

^③ 参见罗志田：《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这已牵涉到史学的基本面相，个人学力有限，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

一、言有枝叶：直面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从史料存留的残缺角度言，每一时代的差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程度不同。即使不论史料存留的片段特性，时代的断裂经常发生，也是不可否认的。尤其像近代中国这样天崩地裂式的大中断，是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置的。

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而“道”一旦失范，典范不能维持，就容易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说的“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刘咸炘所谓“道晦而学末，学末而各道其道”，^① 是很有分寸的概括。

然而，“各道其道”，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传统中断之后，确可能出现非复既往的散乱无序状态。常乃惠曾说：“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② 本体既失，各部分便不复能展现整体。若处于类似近代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则旧事物的残存即或复出，也可能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而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Alasdair C. MacIntyre）所言：许多关键性词汇仍被继续使用，却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

^① 刘咸炘：《中书·流风》，《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50页（册一）。

^② 常乃惠：《与王去病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续）》，《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4月13日，第2版。

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含义。^①

故进一步的问题是，断裂的片段可以反映出整体吗？假如历史是一棵树，其理想状态便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但这只在热带或温带的一些地区才可能始终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既可能是往昔那兀立的秃干，也可能是折断的枯枝，更可能就是一片片散乱的落叶。惟不论干、枝、叶，都有其“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② 很多时候，叶片的独立意义固然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后者却仍可反映在飘零的落叶之中。干、枝亦然。

我们现在知道，任何脱离整体的生物片段，都保留着原有的基因；若得到很久以前的生物碎片，便可通过DNA的检测反观生物的整体。文化其实也相近。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包括中断后的传承，是非常强的。例如，四川至少从汉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谓“文学”见长，而正统的经学则相对弱（至少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述，都与中原互异）。因明末的战乱，四川人口剧减至清初的不足十万户，在“湖广填四川”后更成为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学”见长；而在经学方面，也还颇显特异之处（后来公认的大师廖平，便曾被视为儒学异端）。^③

^① Alasdair C.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nd ed., 1984, pp. 1–3. 此书有中译本：《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参见第3~4页。

^② 若深入追寻，树也是个“片段”——它本从种子一路成长而来，而种子又是树所结之果实。树既非起源，又非结果，而有其价值。树如此，枝、叶亦然。

^③ 参见罗志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见日或月映万川那种间接的映照关系，在太阳和月亮从我们视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后，映射过太阳的水滴和映照过月亮的万川仍存留着日月的痕迹。章太炎所谓“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① 其实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留其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观形的侧面进入之法（详另文）。

而且，传统的中断永远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② 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着历史上“并无其事”，更不能以为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③ 所谓传统，或许就像孔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同时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历史亦然。它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进而言之，散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中国固有的表述风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断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为之，不过点到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国古人著述的特点，不仅长期体现着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的特征，语尚简洁；而且有着一种学理的自觉，即承认言不尽意，却又很注重言外之意，甚至

①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394页。

③ 蒙思明：《历史研究的对象》，《华文月刊》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5页。

追求一种冯友兰所说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冯先生注意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按道家的说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古人“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皆不够明晰。然虽“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且正因昔人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①

或因此表述风格的影响，或因为时代的距离，也可能就因研究者的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们：从表面看，“古人著书，虽无体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穷深极幽，决非零碎感想”。善学者当“由其散著之文，以会其无尽之意”。^② 其实，说古人著书无体系，多少也带有后人的“体系”观。在朱子看来，“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读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着落，“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整齐排列就会自然显现。

后人眼中的“体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决非零碎感想，第二他们还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种“枝叶”式的表述。再看《汉书·艺文志》描述汉代经学的现象：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6），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②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仲光记语》，《熊十力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卷，第207页。